

步著歷史的軌跡探索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教育的問題(下)

鄭麗敏

Uncovering Some Problems in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by Following the Footstep of History

(Continued from Vol. 31, No. 2(1994), pp. 195-217)

Li-min Cheng

*Graduate Student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Tamka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三、圖書館學校關閉了——尋找問題的根源

1978 年奧勒岡大學(Univ. of Oregon)圖書館學校關閉了，校方的說詞是因為財務困難的關係，因之成了杜威之後，美國第一個被關閉的圖書館學校(註一〇二)。但是緊接著，包括著名的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到 1992 年止已有 14 所圖書館學校關門(註一〇三)。直到最近加州伯克萊大學圖書館學校亦傳出暫停招生的消息(註一〇四)，未來情況如何尚難預知。

圖書館學校為什麼在這 15 年內會產生這種似乎是骨牌效應的現象，一般判斷的原因不外下列幾種：

1. 學校財務困難，先找小的學校下手。
2. 因為政治因素而迫使圖書館學校關門。
3. 圖書館學校的品質問題。
4. 教師的研究不夠或不適當。

5. 圖書館學校的行政主管及教師被孤立於大學學術圈之外。
6. 校友的力量不夠，又無法提供大筆的捐贈。
7. 老師的研究計劃太少，不易得到外界的合作計劃。
8. 缺乏領導人才。
9. 圖書館員市場減小。
10. 來自其它學系的壓力及競爭。(註一〇五)

圖書館界的人卻很少人去觸及這一現象的探討，因為大多數的人都寧可使自己相信，圖書館學校的關閉是經濟萎縮、政治迫害使然。圖書館學校為何被關閉？經費緊縮這個原因常常被提出來，但是從實際數據看來，節省的經費相當有限：以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來說，關閉之後，每年只有省下美金50萬到70萬元之間(註一〇六)。

在大學裡面具有學科領域導向的學系，總是對於那些具有任務導向之專業學系懷著存疑的態度。比起宗教、醫學、法律、商業學校而言，圖書館學校是比較容易受到攻擊(註一〇七)。我們必須了解，大學的行政主管是否支持某些系所，通常根據三種因素來決定：1. 能否吸引許多學生來就讀；2. 能否爭取到研究獎助、研究計劃；3. 教師的研究和聲望(註一〇八)。

上述三項要求圖書館學校都沒有辦法達到，其實深究造成圖書館學校關閉的原因，大家將會發現，大部份的問題竟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也只有靠我們自己來解決。為什麼圖書館學校應該保存下去，而且要強化它？為什麼需要圖書館學教育？如果連老師們都無法令人滿意的表達出他們的意見，使學校當局相信圖書館學校的確有必要存在；假如連老師都如此「不確定」圖書館學校存在的目的與價值(註一〇九)。那麼，圖書館學校遭到關閉也就沒有什麼可以埋怨的了。

探討圖書館學校遭到關閉的原因，筆者認為下面幾個問題必須提出來討論，這些問題沒有得到解答之前，圖書館學校的危機是不可能去除的。

(一)理論基礎何在？圖書館學的哲學是什麼？

圖書館學有理論基礎嗎？如果有，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是什麼？我們展開所有圖書館學教育課程的內容來看，自然很快的能夠找出這個答案：缺乏理論基礎一直被視為圖書館學無法達到專業的主要原因之一。皮爾斯則由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的博士論文中得到答案，他質疑為什麼我們是借用傳播、

教育、語言學、管理、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而其它領域的博士論文則很少接受他們引用其它學科的理論(註一一〇)？

如果圖書館學教育一定要根基於圖書館學的哲學(註一一一)，我們的哲學又是如何？不管是圖書館學教育者或是圖書館員，恐怕很少有人去想過這些問題，也因此我們在所有圖書館相關的活動中，不管是圖書館學校的教育或是圖書館的服務，都是隨著潮流而走，很少認真的去思考，我們到底在做什麼？我們這樣做目的何在？我們真正關心的到底是什麼？像洪水般的資料？或是那些可以從我們所提供的資料中產生意義的人類？因此我們的所做所為常常是表面化的、短暫的，在不知不覺中把自己當成一名過客，沒能認真的去經營這塊園地。

在社會學這門領域中，所有的研究生一定要閱讀馬克斯(Karl Marx)、涂爾幹(Emile Durkheim)、韋伯(Max Weber)等人的經典之作，他們稱之為「死去的德國人」(Dead German)，也就是說這些是他們領域內最基礎的內容。因之有人反問，圖書館學界有所謂的「死去的德國人」嗎？是不是有這樣的人，他的理念、他的哲學可以讓我們存在於心中，而慢慢地形成永恆的志業(calling)呢？是不是有這樣的人，我們可以從他的作品中學到他們如何寫出這樣的作品？他們為什麼會寫出這樣的作品？由此而變成我們自己研究的模式。因之，皮爾斯強調，我們應該多從過去的圖書館學文獻中再仔細的閱讀，看看是否能就先人的遺著中找出我們的根源(註一一二)。皮爾斯對於理論是持著較寬容的看法，威根(Wayne Wiegand)就不這麼認為；他說，我們自杜威那兒沿襲了實用服務的最高前提，因之，要從服務中去建立理論是不可能的，我們圖書館學沒有所謂「死去的德國人」(註一一三)。

理論不是抽象的，它是一門領域在整個發展過程中所關心的實體、方法及研究的問題，這樣的理論是實務工作者乃至於研究者所需要的(註一一四)。但是理論的建構需要長期的研究與奉獻，在未能得到這樣的理論來供我們根植其上之前，似乎可以思考一下，造成我們隨勢而「浮動」尚有一個原因，就是無論圖書館學教育者或圖書館員都普遍缺乏對於「圖書館學」的認知。我們知道「哲學」是影響任何人思考及行事的根源，缺乏哲學觀是使人行事漫無目的的原因，也是造成行事看法總是無法深入的原因。

席拉提到圖書館員應該把「符號的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當

做圖書館學理論的基礎，「符號的互動論」源自米德(George H. Mead)所謂的人們心智互動之「精神物理」(Psycho-physical)的過程。席拉所揭示的圖書館學哲學，對圖書館所服務的讀者而言，我們所要關心的是，傳達給他們的知識(knowledge)而不是資料(data)本身，知識和使用者的互動對使用者心智所產生的影響，就是我們該研究的範圍(註一一五)。

萊特(H. Curtis Wright)認為圖書館學應該是根基於正式的思想結構(formal structure of ideas)，及由知識理論組織而成的一種具有智慧的專業；但現在卻已變成了根據物質數據的資料實體，及由行動理論來操作的實證技術(empirical mechanics)(註一一六)。波爾(J.J. Boll)更指出，假如圖書館學是一種買賣(trade)，而不是一種專業，我們大可只要教一些立刻可以用得著的東西。但是「專業」又偏偏是圖書館員及圖書館教育者所日夜追求的目標，因此，前人的學習經驗亦是我們該注意的重心(註一一七)。筆者認為波爾也指出了和皮爾斯同樣的看法，從前人的經驗及論著中去探索理論及哲學的根基。

其它專業的權威來自於知識本體，而圖書館員的權威卻來自於我們認為可供讀者利用之知識本體的特性(註一一八)，這也是圖書館專業一直不被認同的原因之一。

(二)該注意的核心在那？——學術與研究

自從1920年代以後，圖書館學校紛紛走入了大學的殿堂。此一趨勢反映出，圖書館學是一門專業或可成爲一門專業的信念。但是圖書館學欲發展成爲專業所需要的學問則需要一羣學者進行許多的研究，使得知識本體成長及提煉知識本體。這些學者們應該帶給圖書館學持續的、學科的(disciplined)、批判的、專門化的，及從容進行學術探究的理想，不論其專精的學科是什麼，這才是一位學者之志業的象徵(註一一九)。雷瓦德上述的這番話已點出了圖書館學應注意的核心所在，但是如果圖書館學界過去曾認真的思考過「專業」或「學術」的真諦，爲何至今尚被排擠在「專業」及「學術」之外？

阻礙圖書館教育者進入學術圈，除了威廉森所提出的圖書館學校太小及課程太短暫之外，雷瓦德更指出值得注意的兩點：1. 沒有什麼學術抱負的教員佔極大的比率；2. 缺乏可以被認爲有成果的學問(productive scholarship)。自1923年來，圖書館學在學術這一方面的進展十分有限(註一二〇)。

，同時由於圖書館學教育者不足以被稱為「學術」人員，導致圖書館學專業的發展緩慢(註一二一)。但是所有大學都強調優良的教學及獎勵研究，而對付那些缺乏研究者，這個遊戲規則是我們應當了解的(註一二二)。

研究是我們最大的弱點，但是我們必須在研究及教導研究上繼續努力，才能和在大學內的其它學科研究一樣擁有堅定的地位(註一二三)。圖書館學校的聲譽大都建立在教師的出版，及其在學會服務的知名度；由於著重專業教育功能而減少基本課程的結果，圖書館學校只是教一些技術的應用。但是如果圖書館學教育者只在課堂上講授一些實務及技術，他們就不可能做些基本的研究(basic research)(註一二四)。

多少個研究告訴我們，研究才是知識累積的基礎，累積足夠的知識基礎才足以成為學術領域中的學門，如果圖書館學校是以訓練圖書館員為志，那麼教師要注意的是圖書館及其使用者的真正需求是什麼？如果沒有透過研究來解釋及了解現象，也難怪圖書館學校訓練出來的準館員總是不合需求，也難怪圖書館員總是躲在自己的象牙塔內我行我素。不管圖書館學校設立的目的何在，圖書館學教育者有責任透過研究來傳授圖書館學的知識體系，否則圖書館學校的存在就令人質疑了。

在芝加哥大學成立之後，圖書館學研究雖然蔚為風潮，但是大多數的研究只是針對問題的解決，因之研究結果相當的瑣碎、短暫而無法連貫。以致於使得我們的研究就像專業本身，分散在沒有任何正確的參考架構之情況下進行(註一二五)。其實圖書館學研究的潛力是很龐大的，但是因為圖書館學教育並未對圖書館學本身多予提出討論，因此就永遠不可能導出基本的研究(註一二六)。

1951年至1971年間美國圖書館學校的博士班，從原來的三所(芝加哥、伊利諾、密西根)增加到18所，照理在圖書館學的研究方面應該有所增進才對，但是索瑪斯卻發現這些研究對知識的累積貢獻非常少，因為大多數都是歷史的及敘述的研究(註一二七)。

除了研究方面的缺乏之外，圖書館學校所面臨的另一嚴重的障礙是，無法讓其它學系的同事了解其學術內容，例如資訊檢索及資訊科學的研究，和一般學者所習用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程序並不符合，但是圖書館學校卻一直固守著這個部份不放(註一二八)。圖書館學校在研究方面既缺乏量也缺乏質

，而被視為哲學的孤立(philosophical isolation)(註一二九)。這種孤立才是最根本的困境，也是最不容易克服，但又是最需要解決的。

一般而言，圖書館學校普遍缺乏知識的聲譽(intellectual respectability)(註一三〇)，由於學術界普遍認為，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缺乏學術的內容、圖書館學教育無法增進大學的形象，因之危及許多學校的圖書館學教育(註一三一)。像所有其它專業一樣，研究是圖書館專業的主要部分，教育者不但要負責傳遞知識，同時還要創造新的知識(註一三二)，我們能嗎？沒有研究的基礎，又沒有知識的累積，圖書館學所面對的是知識的破產與財務的破產(註一三三)。

(三)我們的共同弱點在那？

如圖書館在機構中的地位一樣，圖書館學校在大學的所有系所中的地位及重要性也一直不被重視。有些圖書館學校也許會說：「我們和上級單位的關係非常良好」，可是當尋求支援的這條「線」中斷，圖書館學校將面臨什麼樣的結果？杜威所創設的第一所圖書館學校可以給我們很好的例證。如果不是校長巴納德的大力支持，杜威不可能在哥倫比亞學院圖書館建立其圖書館學校。等到巴納德一離開這個職位，杜威頓時失去了强有力的靠山，他所憑藉的是「政治」的關係，其結果如何？其實它才是第一所被強迫關閉的圖書館學校。

畢斯(Marry Biggs)及布克斯坦(Abraham Bookstein)曾針對美國45位圖書館學校老師進行調查，要求他們對於構成圖書館學校高品質課程的要素提出看法，但是除了62.2%的人對於教授的研究及出版有較一致的看法之外，其它幾乎沒有共同的想法(註一三四)。許多圖書館學校更有所謂確認身份(identify)的問題，到底是圖書館學校、資訊科學學校或是二者並存？到底是研究導向，或是實務的學習？圖書館學校是否期望太多或太少？圖書館學校只是為了訓練進入圖書館工作的館員嗎？圖書館學教育到底要不要全面的重新改造(註一三五)？對於許多根本問題，我們都無法得到較為一致的答案；對於許多關鍵性問題，我們都無力解析。我們的弱點在那？

圖書館學校關門了，但是這個話題很少在公開場合被提及，針對這個問題來討論的文獻也不多(註一三六)。對圖書館學教育者最大的指控莫過於懷特所言，他說：大多數的教師從不在公共場合討論圖書館學校關門的事，怕

嚇走了學生而使得情況更糟(註一三七)。避免討論敏感話題也是我們的弱點之一。

但是針對圖書館學教育問題所做的各種批評，卻被羅斯坦歸之於館員的個性使然。他把 1887 年到 1981 年間有關對圖書館學校的批評加以分析，發現這些批評無論內容、語氣、特點，或抱怨竟有許多相似之處，這些埋怨及批評包括：

1. 圖書館學校太保守，拒絕改變。
2. 圖書館學校的講師是一些較差的人。
3. 圖書館學校就像其它專業學校，總是會遭到相同的批評，這是不可避免的。
4. 總是有些人會被埋怨，館員及圖書館學校是最自然的目標。
5. 圖書館學校的課程不夠社會化。
6. 圖書館教育很乏味的理由是，圖書館學本身就是一種枯燥無味的主題。(註一三八)

羅斯坦引了凱利(Walt Kelly)的一句話：「我們已經看到了敵人，他就是我們自己。」他認為館員批評圖書館學教育，是因為他們對於自己、他們的同事以及他們專業的地位相當懷疑。他甚至引用數篇有關館員性格及圖書館學校學生性格的文獻來證實他的看法(註一三九)。

令筆者質疑的是，羅斯坦對於有關批評圖書館學教育缺乏知識內涵、缺乏理論基礎、總是教些實務的技術、缺乏研究以致不被學術圈所認同、修業年限太短根本不合專業的標準等重大的批評竟隻字未提，而把對於圖書館學校的批評歸論於館員個性使然。是看不到真相？掩飾真相？或逃避真相？

(四)圖書館及圖書館學校——永不相交的平行線

翻開過去的文獻記載，館員批評圖書館學校教育不務實，所教非所用；圖書館學校則認為館員所知道的只是實務，一點也沒有理論基礎。只要是針對館員的調查，其意見一定是最好再多學點更實用、更新的知識或技術；而教師則總是持相反的論調。彼此互相輕視的現象也一直是隱約若現。事實上導致二者緊張的關係和衝突，不只是由於對實務或理論有不同的看法，更由於對知識本體內涵的認知及對知識本體發展之態度完全不同之故。由於外在受到社會、技術、財政、政治力量的影響，內在又受到機構要求達到效能的

壓力，館員所要求的知識往往是實證的，只用一次及立刻用得上的，這些知識大抵是透過圖書館實務經驗分享而來(註一四〇)。

館員一向認為圖書館學教育者的研究和他們的業務毫不相關，不符合實際的需要(註一四一)。白萊士(Mark Plaiss)甚至認為，圖書館學校應該訓練有足夠能力且可靠的館員，而不應該期望學生畢業後再從工作中學習，因之應該以職業取向教一些特殊的技巧，因為沒有雇主願意雇用一個不能做事的人(註一四二)。白萊士顯然沒有讀過圖書館史，更顯然沒拜讀過哈金斯的《美國的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不過他的看法更可以充分說明，館員對於圖書館學校教育所持不同立場的觀點，圖書館所要求的是能夠立刻執行圖書館服務功能的館員。

由於在研究所時未給予有關研究價值的欣賞指導，實務工作者幾乎不讀研究報告(註一四三)。而他們的工作負荷亦使之無力從事研究(註一四四)，圖書館員和研究之間的關係可說是非常的小，這一現象和圖書館員埋怨用不上教師的研究結果也有很大的關聯。

但如果從建構知識的觀點看，雷瓦德卻認為館員和圖書館學校教師衝突越尖銳，且越表現出學術責任和專業需求在根本上的不同，我們才能更接近真正的研究所專業教育，才能避開職業及技術訓練的限制，也才能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更清晰的討論、更多更深具意義的文獻來挑戰及引導專業的政策及實務，將能夠更有自信的了解現在及適應未來，並帶給專業實務界一些廣泛而深入的知識、具有知識的及批判的判斷，及有知識的內涵(註一四五)。如果照雷瓦德的說法，我們似乎沒有必要為圖書館及圖書館學校所各執一詞的不同看法太在意。問題是，如果圖書館學校是在兩種立場之間搖擺不定，那就不是一種好現象了。

1900年美國圖書館學會的圖書館訓練委員會制定了第一個標準，由於這個標準的水準太低，大家都想再擬定一個更好的標準。但是由於圖書館實務工作者和學術界人士觀點不同，延續了15年尚無定案。乃至於1915年成立了美國圖書館學校學會，希望經過他們的努力能夠制定出一致的認可標準(註一四六)。圖書館及圖書館學校的歧見似乎由來已久，海曼(R. Hyman)個人覺得，圖書館員並不喜歡圖書館學校的老師，他們如果到圖書館去總是被懷疑是不是來挑毛病的(註一四七)。兩者的關係若是演變到如此地步，如何

談到合作共同解決問題？

五、我們該走及能走的路在那兒？

1923年「威廉森報告」提出至今已有70年，在這期間有多少人提出一篇又一篇的報告及建議，多少單位召開一次又一次的會議，但是均未對圖書館學教育產生多少影響。多數人的意見也被評為舊調重彈，了無新意，這意味著什麼訊息？圖書館學校教育的老問題仍然存在？如果過去的改進建議曾經採納，為什麼仍陷在困境之中？是否所改進的重點不對？是否只在表面上加以改進？或是過去的建議未被當真，以致於使我們的處境如此艱難？如果像哥倫比亞及芝加哥大學那樣具有最佳專業水準的圖書館學校都遭關閉，還有那個學校值得再維持下去(註一四八)？

對於為何圖書館學校老是被學校當局視為可關閉的對象，懷特形容說：我們好小，我們好弱，我們是孤立的，我們是看不見的(註一四九)。但是自憫無助於重新建立信心，自艾亦無補於原本脆弱的根基，如果圖書館學是我們所深切關懷的根源，是我們終身志業所託，就讓我們更坦然的接受嚴厲的批評和剖析，勿再佯裝著若無其事，勿再自欺欺人似的告訴大家說：圖書館學校關門不過是一時的現象。

對於圖書館學校未來何去何從，談得最多的莫過於應該增加學生人數、加強和外界及上級單位的關係等；另有一部份學者則從知識的著眼點來尋求解決之道。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各種想法的背後都有其支持的理念，就讓我們來看看，那一種做法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一)從外在加以改善

一般只要是認為圖書館學校被關門是因為人數太少或政治因素的，大都會提出一些由外在現況來改善的辦法。

擴大圖書館學校，意味著可以延攬具備強有力學科背景及對圖書館問題有興趣的人才，同時將有足夠的人力組成研究小組來進行各種研究，加強研究成果。擴大的方法除了和其他系合併外，還有一個方式是把幾個圖書館學校合併在一起，如此至少還可以保留著圖書館這個實體(註一五〇)。

與其它學術單位合併雖然是一種增加資源的方式，但是如此可能產生兩

種不同的結果，一是圖書館學的實體消失了，也就是另一合併的單位較為強勢；另一情況是合併的學校能發展協力合作的關係，如此則可強化圖書館學(註一五一)。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傳播、資訊與圖書館研究所就是合併相關科系成功的一個例子(註一五二)。

由圖書館學校向其它學系提供相關的課程(如：圖書館利用指導及書目指導等)，与其它系所成立聯合計劃，如此可以吸引學生就讀、增進圖書館學校和其它系所的溝通，引發其對圖書館相關研究問題的興趣(註一五三)，亦可使圖書館學校免於孤立(註一五四)。此外圖書館學校還可以建立聯合課程計劃或聯合教授的方式，以搭起和其母機構學術生活的橋樑(註一五五)。另外若可以增進和外界的公共關係(註一五六)也是避免被孤立的方法之一。

相信圖書館學校因為得不到外界的大筆資助才受到歧視，或是因為經濟困難才遭到關閉者，則主張圖書館學校應該積極爭取獎助及其它外來的經費補助，以解決經濟問題(註一五七)。但有位教授指出一個奇怪的現象是，提供圖書館學校研究的經費很少，但是舉辦講習、繼續教育及其它服務項目活動的經費卻不少(註一五八)。如此看來，經費運用的目的才是關鍵所在，如何讓提供經費者了解圖書館學研究的價值，這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有人主張把專業和學術明顯的區分開來，即專業指導的師資和學術研究的師資分開，不過如此會形成擴大編制的壓力(註一五九)，而擴大編制的實質意義則是增加經費，這恐怕不是大多數人所樂於見到的結果。

對於圖書館學校的改革及生存之道，塞普斯(K. F. Ceppos)主張除了限制課程及就讀人數在校方可支持的程度之內、擴展課程以吸引較廣泛的對象來就讀、和其它系建立合作關係以強化課程、增加教授的出版及開發可吸引校園內其它學生的課程、和其它系所或其它圖書館學校合併等方式之外，還有開創財源、選擇具有智慧且能夠充分對外界表達圖書館學校訊息的系主任及在課程方面加以改革及發展(註一六〇)。

許多圖書館學校採取更改名稱的作法，在原來的名稱加上資訊科學或資訊研究，但是資訊(information)不是一種專業也不是一種職業，它更不是一種學科領域。為了掩飾而更改名稱只會使之烙上欺騙的標幟，這是騙不了別人的(註一六一)。

(二)由內在加以改進

主張圖書館學校應從課程方面加以改進者亦不在少數。1960年代，席拉在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首度提出整合性核心課程。此後，許多圖書館學校開始採用不同的整合性核心課程，其內容不外乎包括一些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所通用的理論、哲學及基本技巧。也就是說除了傳統的核心課程之外，並加入了有關的概念及方法論方面的課程(註一六二)。

圖書館學教育的專門化是衆多圖書館學校所走的方向，所謂第六年的碩士課程就是因此而產生，因為一般性的課程無法滿足學生踏入各類型圖書館的需求，大多數圖書館學校均以圖書館類型來區分課程內容，如：大學圖書館、音樂圖書館等。波爾不以爲然，他覺得課程應該依功能來區分，如：1. 書目及讀者服務；2. 社會、啓發及公共關係；3. 中高階層行政；4. 學校及兒童圖書館；5. 資訊科學等(註一六三)。

也有學者認爲圖書館學校的課程應該就資訊、使用者，及服務來加以整合。因爲如果圖書館服務的任務是將資訊帶給人們，那麼這一任務並不會隨著媒體的改變而受到影響，因之未來圖書館學教育的課程有四大項：

1. 資訊在社會及圖書館服務中的角色。
2. 服務對象的需求、資訊蒐尋行爲及所在機構的大環境。
3. 資訊檢索的理論與實務：編目、分類、索引、書目等。
4. 用來發展及提供良好圖書館服務之管理的、政治的、技術的方法。

(註一六四)

圖書館學、圖書館科學、資訊科學，到底那一個才是我們的重心，我們是不是真正了解它們的含義？我們到底想藉著它們達到什麼目標？這個問題是奧德(L.W.S. Auld)認爲解決圖書館教育要先澄清的第二個問題(註一六五)。依照奧德的看法，資訊科學顯然只能做爲達成圖書館服務的一種方法，它不能成爲圖書館學的主體。改變課程或學校名稱是很容易的事，但是要保持課程的完整性，同時顧及全面性則較爲困難了。

除了課程內容之外，研究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部份。但是研究的重要性不是由可以立即實際使用的標準來決定，而是以一種廣泛的及抽象理論的方式來貢獻知識。如果教育者要贏得學術界的認同，這樣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註一六六)，因之在研究所最好的老師也應該是研究人員(註一六七)。而且在高知識階層重新建構課程，亦需要强有力的理論基礎，同時應該從技術導向

提昇至真正的專業(註一六八)。當我們提出的知識是獨一無二，而且可以讓其它領域的學者一起分享時，這才能稱之為有足夠的水準(註一六九)。

例如由現代化科技影響傳統圖書館的角色來看，可以供我們研究的項目就有不少：

1. 經濟情況除了影響圖書館之外，是否也間接的影響出版業及書籍交易，他們和圖書館所產生的互動關係如何？
2. 圖書館與社會的關係、有關閱讀的研究、資訊和使用者之間的關係，都可以進一步分析研究。
3. 技術：包括通訊技術、儲存媒體、個人電腦新形式、出版品等，如何影響資訊的組織及利用。(註一七〇)

除了課程及研究之外，圖書館學教育的哲學則是少數有心者所呼籲的。席拉認為或許我們可以從高等教育領導者的傳記及哲學作品中，學習圖書館學的教育應該怎麼做，而不是從圖書館學教育文獻的本身去探索。他提到三位教育家的作品，對於建立我們在高等教育中的哲學是有幫助的：

1. 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的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2. Alfred North Whitehead 的 *The Aims of Education*.
3.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的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上列書的第三本在1936年第一次出版時，席拉就在美國圖書館學會冬季會議上告訴與會人員，學術圖書館員每星期都應該拿出來虔誠的讀一次。席拉表示自己曾讀了許多次，而且每次閱讀均有收穫(註一七一)。

圖書館學教育的失敗在於缺乏理論結構，圖書館學總是處於跟隨著而不是處於領導的地位(註一七二)，這真是我們永遠的痛，如果無法針對它來謀求對策，要想提高圖書館學校的地位恐怕只是奢望。

(三)專業模式或學術模式應有所定奪

進入大學之中使用專業學校的名稱，並未為圖書館學校帶來合法的地位，授予碩士學位也並未使圖書館學得到特別的尊重(註一七三)，圖書館學何去何從？唯有圖書館學教育者願意改變，才能重新找到應走且能走的路。

高等教育之中有兩種不同導向的學術機構，一是研究導向，主要的興趣在資訊及知識的合成(synthesis)、製造及傳播。這些研究導向的機構把教學放在次要地位，強調學術及學術成果、研究所教育、外界的研究資助及學

術特性。而另一種教學導向的機構則強調高品質的教學、大學部教育、以畢業生進入研究導向的機構為榮、發展緊密及持續的校友基礎以尋求其支持。由於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及專業學校的特性，因之和研究導向的大學關聯極為脆弱，貢獻也極少(註一七四)。

朝向專業學校發展，主要在增進將來要進入特定職位所需的知識及技巧。圖書館學校如果有心成為專業學校，就應該像醫學、法律、工程等專業學校一樣，1. 加強校友聯繫；2. 學生的貢獻、教師的學術成果、外界的資助都要有顯著的表現；3. 擁有被決定為專業的技巧。商業、護士及音樂學校所以無法擁有政治的影響力，主要就是因為這三種要素均仍處在較低的層次。以商業學校來看，其重視的是資訊及營利單位，由於和量化方法關係密切，他們吸收資訊科學及使用工程和電腦做為處理資訊的方法，均比圖書館學校來得容易。同時以一個服務機構而言，商業學校在提供新的服務及增進資源分享上，顯然比圖書館學校做得好。圖書館學校如果站在和商業學校的觀點來經營，是否會有較好的突破？但是如果站在營利機構的角度來發展，則有必要對專業及教育的結構重新調整。提高教育層次及專門化是必要的措施，但是必須為之付出代價，這個代價就是要重新思考圖書館的任務及圖書館員如何在圖書館內工作(註一七五)？專業地位是圖書館員一心一意追求的目標，但是為了要達到真正的專業，我們是否能痛下決心，坦然接受進入專業之前的重新洗禮呢！

若是朝向學術模式(academic model)，也就是說主要目的在增進將來可以適任多樣化職位之知識及技巧(註一七六)。這也意味著圖書館學必須在知識的貢獻方面有所表現，必須接受和其它學術單位同樣的評量準則，即是以前學術成果來評量圖書館學校的質。如此一來只有在接受同儕評論的期刊上發表的文獻才算是學術論著，目前許多圖書館及資訊科學的期刊將因此而受到影響。而缺乏大學部當做知識的基礎發展，也可能會遭到其它具有學科基礎之系所的質疑。因之在決定要轉向學術模式之前，有必要評估成立大學部之潛在需要及政治需要。學術模式亦意味著給學生更多的選擇，但是提供專業生涯的預備課程並不是學術模式的正確方向；專業生涯是研究生自己的選擇，不能做為圖書館學校的方向。學術模式亦意味著增加種類、減少專門化，因之不但要教育學生有關圖書館學的知識，同時要增進其第二個領域的知識

。反覆灌輸就業的技巧在學術模式內是行不通的(註一七七)。

圖書館界實務工作者所期待的是專業的知識，而學術界所要求的是從事研究而避開專業，基本上這兩種模式是互斥的。學術模式以研究、教學、服務依序為其重點。而實務者模式則以訓練未來的專業人員、服務、研究依序為其重點。前者重視研究，而後者不重視研究(註一七八)，兩者的區分是顯而易見的。要走向專業或學術，各個圖書館學校自應有所決定，但不可能兩者並存。校園內原來就具有相當地位的專業學校，其校友羣相當龐大而穩定，且具影響力，使得這些專業學校能夠吸引外界的資助及程度好的學生前來就讀，而圖書館學校離此境界尚遠，因之在財務困難時易成目的物。而如果圖書館學校要走向學術模式，那麼一定要遵守和其它學術單位相同的規則，過去圖書館學校是很少遵守這些規則的(註一七九)。

無論採用那一種模式，它都只是提供一種方式，重要的是我們的目的何在。如果此時仍不採取行動，那麼圖書館學校將會持續關閉下去(註一八〇)，專業地位之爭也將永遠持續存在。

四圖書館與圖書館學校如何共同化解危機

和圖書館學同時期發展的政治學已由政治管理(political economy)成功的改為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因為政治科學家很早就指出，他們不是在訓練或教育政治人物，同時界定其感興趣的範圍為探究政治和政府各方面的問題(註一八一)。如此看來，訓練圖書館員到底是否應該成為圖書館學校的責任？是否因為圖書館學校一直把訓練圖書館員視為己任，以致於圖書館學一直無法成為學術的領域？

圖書館實務工作者很少在應用的時候創造知識，他們從教師那兒得到知識，而教師又從研究者那兒得到知識(註一八二)。因之發展研究可促使教育者及實務工作者雙方共同合作來界定問題及尋求解決之道。除非教育者及實務工作者能一起接受挑戰、共同合作，否則未來不可能有光明的遠景。由於圖書館員所給予一般大眾的感覺會影響就讀圖書館學校的意願，因之圖書館員及圖書館學校必須共同合作改變一般人對圖書館員的感覺(註一八三)。圖書館學校若能和大學圖書館合作，將可以共同計劃改進圖書館的作業，同時使圖書館學校在大學中更容易被看到(註一八四)。圖書館教育的危機需要教育者和實務工作者共同努力去化解(註一八五)；讓實務工作者能欣賞研究，

讓學術界了解專業的奉獻，由二者的平衡來維繫圖書館學校的信譽，奧德將之列為圖書館教育首先必須解決的議題(註一八六)。

或許圖書館學校的主管可以考慮，既然圖書館學校的課程和許多學科如此相關，而老師又那麼少，是否可能在研究圖書館(Research Libraries)中發展研究所的課程，而讓圖書館學校繼續的教育那些對於教學及研究有興趣的人(註一八七)。如此也就是讓圖書館學校不再以訓練圖書館員為己任，圖書館學校能夠跳出百年來所自設的界限嗎？

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校教育是彼此牽連的，不僅因為他們的目標一致，而且因為彼此生存息息相關(註一八八)。儘管兩者對於實務及理論的觀點互異，但是他們關心資料及使用者的理念應該是一致的；儘管兩者的作法不同，但是他們所欲尋求的理想應該是相同的。

六、結 論

學術專業(learned profession)的主要內容是知識(intellectual)(註一八九)，除非專業學校的活動在研究或技術機構中仍有值得保存之處，否則沒有知識內涵(intellectual contents)的專業學校將會全數消失(註一九〇)，這不就是為什麼 20 多年來美國圖書館學校逐漸萎縮，甚至關閉的最佳說明。半個世紀前哈金斯看到專業學校在大學中普遍設立，他就針對所有的專業學校提出如此深刻的話，只可惜半個世紀後，知識內涵仍然是我們邁向真正專業的致命傷。

圖書館學教育的目標何在？圖書館學有所謂的知識內涵嗎？如果有，是那些？如果沒有，要如何累積或擷取？學術與研究在圖書館學領域應該佔有何種地位？當深入探究圖書館學教育的問題時，有太多的「不確定」出現眼前。在圖書館學研究所廣為設立之際，有多少人想過這些問題？這才是令人擔心的危機。圖書館課程缺乏理論，而資訊科學則缺乏概念的釐清(註一九一)，面對著未來我們將何去何從？

對圖書館學教育真正有幫助的是每個人所擁有的創造力及豐富的心智，而不是由會議所得到的集體想法；是來自大量研究的成果，而不是來自會議廳數小時喧囂的結果(註一九二)。這也就是說，圖書館學教育的問題不是用

談的方式可以解決的，大家可以看看歷次有關圖書館學教育問題的會議結束後，到底有多少論點得到大家一致的看法？有多少結論為大家所接受並付諸實行？其實，成為學科領域所須具備的理論基礎及知識內涵、進入學術領域所須從事的研究活動，才是從事圖書館學教育者所不容忽視的重點所在。

美國第一個社會學系成立在 1892 年，三年後(1895 年)就發行了第一種社會學期刊，再經歷了十年(1905 年)，第一個社會學專業學會才成立。馬克斯、涂爾幹及韋伯的經典之作即出現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社會學家都可以追溯其知性的根源，相較之下，圖書館學並不年輕，我們也能夠尋找出我們的根(註一九三)。研究所教育的功能之一是在鼓勵學生勇於提出問題及接受挑戰，而非接受現狀(註一九四)。探討圖書館學教育或圖書館學的根本，雖然很痛苦，但是我們仍要深入的去探查(註一九五)。因為唯有透過歷史的批判才能夠使我們更虛心、更踏實的邁向「學術」或「專業」的這條路。

是停止抱怨及開始找尋答解的時候了，否則圖書館學教育將繼續的掙扎到放棄而死亡，成為 20 世紀的恐龍(註一九六)。讓我們認真的從先人所遺留下充滿智慧的歷史文獻中去發覺，他們發自內心、關懷圖書館學的自省，看是否可以從中指引我們走出另一條康莊大道來，而不是盲目的追求著根本不屬於我們的目標。到底是走向學術模式或是走向專業模式都無妨，重要的是在掌握既定的方向之後，能夠符合學術界或專業界所定的標準來走，否則有關「專業」的爭論將永遠持續下去。

(後記：本文承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研究所賴鼎銘教授指正，特此誌謝。)

附 註

註一〇二 M. Paris, "Why Library Schools Fail," *Library Journal*, 115 (Oct. 1, 1990), p. 38.

註一〇三 R. Hyman, "Library Schools in Crisis: Stemming the Tide," *Wilson Library Bulletin*, 65 (Jan. 1991), p. 49.

註一〇四 E. St. Lifer & Michael Rogers, "UC-Berkeley Library School Teeters on Verge of Extinction," *Library Journal*, 118 (March 1, 1993), p. 14.

註一〇五 同註一〇二, pp. 38-42; M.P. Marchant, "The Closing of the Library School a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American Libraries*, 23 (Jan. 1992), p. 33; K.F. Ceppos, "Innovation and Survival in Schoo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33 (Fall 1992),

- p. 278 及 同註六三, pp. 407-408.
- 註一〇六 同註一〇四。
- 註一〇七 A. Bookstein, "Library Education, Yesterday and Today : Library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Setting," *Library Quarterly*, 56 (Oct.1986), p. 361.
- 註一〇八 同註五九, p. 860.
- 註一〇九 同註一〇二, p. 41.
- 註一一〇 同註七六, p. 641.
- 註一一一 H.C. Wright, "The Symbol and Its Referent : An Issue for Library Education," *Library Trends*, 34 (Spring 1986), p. 730.
- 註一一二 同註七六, p. 641.
- 註一一三 同註七六, p. 643.
- 註一一四 同註七六, p. 641.
- 註一一五 J.H. Shera,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eds. Fritz Machlup and Una Mansfield. (New York : Wiley, 1983), pp. 386-387.
- 註一一六 同註一一一, p. 763.
- 註一一七 同註六五, p. 200.
- 註一一八 R. Wedgeworth, "Some Thoughts on the Perils of Library Education : Real and Perceived," *Wilson Library Bulletin*, 65 (Jan.1991), p. 47.
- 註一一九 同註二十, p. 1313.
- 註一二〇 同註二十, p. 1316.
- 註一二一 同註二十。
- 註一二二 H.S. White, "Politics, the World We Live in," *Library Quarterly*, 61 (July 1991), p. 265.
- 註一二三 同註七四, p. 18.
- 註一二四 同註一一一, p. 770.
- 註一二五 同註三八。
- 註一二六 同註一一一, p. 771.
- 註一二七 W. Summers, "The Emergence of Library Education," *American Libraries*, 3 (July/Aug. 1972), p. 792.
- 註一二八 同註一〇七, p. 368.
- 註一二九 同註一二二。
- 註一三〇 同註五九, p. 860.
- 註一三一 M. P. Marchant, "The Closing of the Library School a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American Libraries*, 23 (Jan, 1992), p. 23.
- 註一三二 同註六七, p. 1991.
- 註一三三 同註五九, p. 860.
- 註一三四 M. Biggs and Abraham Bookstein, "What Constitutes a High-

- Quality M.L.S. Program? Forty-Five Faculty Members' Views,"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9 (Summer 1988), p. 33.
- 註一三五 同註三五, p. 218.
- 註一三六 同註一〇二。
- 註一三七 H.S. White, "Why Do 'They' Close Library Schools?" *Library Journal*, 117 (Nov.15, 1992), p. 51.
- 註一三八 S. Rothstein, "Why People Really Hate Library Schools : The 97-Year-Old Mystery Solved at Last," *Library Journal*, 110 (Apr. 1, 1985), pp. 41-42.
- 註一三九 同註一三八, pp. 45-46.
- 註一四〇 同註二十, p. 1313.
- 註一四一 同註二十。
- 註一四二 M. Plaiss, "New Librarians Need Skills, Not Philosophy," *American Libraries*, 14 (Oct. 1983), p. 618.
- 註一四三 L.W.S. Auld, "Seven Imperatives for Library Education," *Library Journal*, 115 (May 1, 1990), p. 56.
- 註一四四 同註一〇三, p. 48.
- 註一四五 同註二十, p. 1317.
- 註一四六 同註十三。
- 註一四七 同註一〇三, p. 48.
- 註一四八 M.F. Stieg, "The Closing of Library Schools : Darwinish at the University," *Library Quarterly*, 61 (July 1991), p. 266.
- 註一四九 同註一二二, p. 264.
- 註一五〇 同註一〇七, pp. 366-367.
- 註一五一 同註七二, p. 323.
- 註一五二 同註九八, p. 574.
- 註一五三 同註一〇七, pp. 367-368.
- 註一五四 同註三五, p. 218.
- 註一五五 同註六八, p. 726.
- 註一五六 同註一三一, p. 36.
- 註一五七 同註一〇七, p. 369.
- 註一五八 同註一三四, p. 35.
- 註一五九 同註一〇七, p. 368.
- 註一六〇 K.F. Ceppos, "Innovation and Survival in Shooo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33 (Fall 1992), p. 278.
- 註一六一 同註七二, p. 325.
- 註一六二 同註九八, pp. 572-573.
- 註一六三 同註六五, pp. 208-209.

- 註一六四 M.K. Buckland,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in the Next Century," *Library Trends*, 34 (Spring 1986), pp. 785-786.
- 註一六五 同註一四三, pp. 56-57.
- 註一六六 同註二十, p. 1315.
- 註一六七 同註七四, p. 18.
- 註一六八 同註一三一。
- 註一六九 同註一二二, pp. 265-266.
- 註一七〇 同註一〇七, pp. 362-365.
- 註一七一 J.H. Shera, "Twelve Apostles and a Few Heretics,"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10 (Summer 1969), pp. 3-4.
- 註一七二 同註三八, p. s5.
- 註一七三 同註三一, p. 170.
- 註一七四 同註三一, pp. 164-165.
- 註一七五 同註三一, pp. 172-174.
- 註一七六 同註三一, p. 172.
- 註一七七 同註三一, pp. 174-177.
- 註一七八 同註一四三, p. 56.
- 註一七九 同註三一, pp. 166-167.
- 註一八〇 同註三一, p. 178.
- 註一八一 同註三一, pp. 155-156.
- 註一八二 同註一一一, p. 770.
- 註一八三 同註六七, pp. 1991-1992.
- 註一八四 同註一〇七, p. 367.
- 註一八五 同註一一八, p. 48.
- 註一八六 同註一四三。
- 註一八七 P. Battin, "Developing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Library Professionals: A Director's Perspective," *American Libraries*, 14 (Jan. 1983), p. 25.
- 註一八八 R.F. Vondran, "Rethinking Library Edu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11: 3/4 (1989), p. 27.
- 註一八九 同註六六, p. 52.
- 註一九〇 同註六六, p. 112.
- 註一九一 J.H. Shera, and Donald B. Cleveland, "History and Foundations Information Science," In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12, ed. Martha E. Williams. (White Plains, N.Y.: Knowledge Industry, 1977), pp. 249-275.
- 註一九二 同註三, p. 260.
- 註一九三 同註七六, pp. 642-643.
- 註一九四 同註一二二。

註一九五 同註一一一, p. 771.

註一九六 同註三五, p. 219.

